



隐逸与文学

李红霞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立于1897

唐代

隐逸与文学

李红霞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隐逸与文学/李红霞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3942-7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
研究—唐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531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唐代隐逸与文学

李红霞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942-7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9

定价:62.00 元

本书获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深圳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唐代士人隐逸兴盛的文化观照	15
第一节 社会治乱对隐逸的激扬	15
第二节 科举制度对隐逸的助长	25
第三节 佛道思想对隐逸的影响	40
第四节 园林的普及与三径之资	49
第二章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58
第一节 初唐隐逸：弃世与游世并行不悖	58
第二节 盛唐隐逸：以隐求仕的魏阙情怀	63
第三节 中唐隐逸：独善其身的闲适中隐	70
第四节 晚唐隐逸：悲苦无奈的愤世之隐	77
第三章 唐代士人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	85
第一节 唐代隐逸的入世化与文学表现	85
第二节 唐代隐逸的世俗化及文学表现	90
第三节 唐代隐逸的心性化与文学表现	94
第四章 唐人对古代隐逸高士的接受	99
第一节 唐代对古代隐逸高士的接受原因	99
第二节 唐代对古代隐逸高士的接受条件	101

第三节 唐代对古代隐逸高士的接受类型	106
第五章 唐代隐逸文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游	124
第一节 唐代隐逸文人的日常生活	124
第二节 唐代隐逸文人的社会交游	146
第六章 隐逸与盛唐山水田园诗	162
第一节 隐逸与山水诗、田园诗的合流	162
第二节 尚清的诗歌审美追求	171
第七章 隐逸与唐诗的主题取向	178
第一节 唐诗中的隐逸旋律	178
第二节 唐诗中的寻隐主题	185
第三节 唐诗中的吏隐主题	195
第四节 唐诗中的仙隐主题	206
第八章 唐诗中隐逸语词意象据议	217
第一节 唐诗中的桃源意象	218
第二节 唐诗中的垂钓意象	229
第三节 唐诗中的白云意象	237
附录：唐代士人隐逸事迹一览表	246
主要参考文献	286
后 记	295

绪 论

一、“隐逸”概念的界定

“隐逸”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应用甚广，但严格地从词源学意义上来说，“隐”与“逸”二者实有不同。《说文解字·自部》云：“隐，蔽也。”^①清代段玉裁注曰：“艸部曰：蔽、萋，小兒也。小则不可见，故隐之训曰蔽。”^②《说文解字·兔部》释“逸”字为：“逸，失也。”^③段注云：“亡逸者，本义也，引申之为逸游，为暇逸。”^④“隐”是为物所遮蔽、藏而不现，“逸”则不仅指行为的遁去，也指精神的超绝，这是“隐”字所不具备的。何晏《论语集解》：“逸民者，节行超逸也。”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总结出三种“逸”：一是不肯受世俗污染的高逸；二是生活人性的清纯、清逸；三是超逸，是对以上两点的总结，“超必以性格的高、生活的清，为其内容，所以‘高’‘清’‘超’都是逸的内容与态度”^⑤。沈约在《宋书·隐逸传序》中道出二者之别：“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今为隐逸篇，虚置贤隐之位，其余夷心俗表者，盖逸而非隐。”^⑥隐者针对的只是现实社会政治，“逸”则夷心俗表，摒弃整个世俗社会；隐还有所待，逸则天人合一。

① [汉]许慎著，[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十四下，中华书局，1963年，第305页。文中所引《说文解字》皆是此版本，不再另行标出。

②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34页。文中所引《说文解字注》皆是此版本，不再另行标出。

③ 《说文解字》卷十上，第203页。

④ 《说文解字注》，第472页。

⑤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76页。文中所引《中国艺术精神》皆是此版本，不再另行标出。

⑥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6页。

在后来的发展中,“隐”与“逸”相合而称,然而其含义仍莫衷一是。本书采用“隐逸”一词有其特别的意义:(一)隐士固然是在隐逸,但唐代还有许多人不是隐士,一生中也有或长或短的隐逸行为,遗漏了后者,对隐逸的了解无论如何都不完备。(二)“隐逸”一词较诸“隐士”更属于中国正史的传统用法。征以历代官修史书所列专门的隐逸传,其称谓也多以“隐逸”标其章目。郑樵《通志·隐逸传》说:“范晔始立隐逸传,谓之逸民。晋、宋、隋曰隐逸,齐曰高逸,梁曰处士,后魏曰逸士,今总曰隐逸。”^①《晋书》卷九四、《宋书》卷九三、《隋书》卷七七均谓之“隐逸”,自此以后,历代沿用此称谓而不变。因此,出于尊重古时用语习惯并考量现今称谓,本书采用“隐逸”一词,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一)隐士主体层面,即历史上存在的隐士个体或群体。如《晋书》卷四六的“搜求隐逸”、嵇康《述志诗》的“岩穴多隐逸”等均表示此意。其名称杂乱,据蒋星煜先生考证,与此同义的名称多达十一种^②,诸如“逸民”“隐者”“隐士”“处人”“逸士”“遗民”“处士”“高人”“高士”“幽人”“隐君子”等。此外,“高逸”“征君”“逸人”“山人”“山林之士”“山谷之士”“岩穴之士”“江海之士”等也义同隐士。

(二)隐居行为层面。隐逸是士人的一种处世方式,是基于现实政治以及个人心性、价值取向和生活需求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表现为短暂或永久的隐逸行迹。与此同义的还有“隐居”“隐迹”“隐绝”“隐遁”“隐沦”“隐退”“栖逸”“高蹈”“肥遁”等。《周易·遯》卦云:“遯,亨小利贞。”唐孔颖达疏:“遯者,隐退逃避之名。”高亨注:“退而隐居为遯。此言人当不可进仕之时,退隐乃通,仅有小利,是亦正道也。”另外,隐逸往往选择山林之地,因此“山居”实际上也是隐居的另一种表述。此外,在唐人使用的

① [宋]郑樵:《通志》卷一七七《隐逸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2833页。

②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页。

名词中尚有很多同指隐逸的，也应是研究隐逸可以取用的也应该取用的范围，如“岩栖”“嘉遁”“归去来”“幽居”等，名异而义同。

（三）人格精神层面。隐逸不仅是一种身份标志，还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包括人格、心态、思想、意识等，表现为一种安静恬退的操守、悠闲散淡的情怀、玄澹雅致的境界和高远脱俗的韵致。它们体现了隐逸的理想与心理积淀，并作为一种文化角色进入民族的价值系统，成为自由与自适的象征。就隐逸而言，内在的隐逸精神才是最本质的，它使士人虽居于庙堂朝市，而能与社会现实疏离，达到“心远地自偏”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王维的禅隐、韦应物的郡斋之隐、白居易的中隐才成为可能。

本书正是在此广义的隐逸范畴下展开研究。唐代的隐逸既缘于社会政治，又多进退由己，情况复杂多样，仕与隐的界限远没有前代那样严格。唐代隐逸不仅是指那些时势与己愿相违时选择高蹈远引、遗世独立的山林之士，而且还指那些频繁游走于仕隐之间的文人，这一部分的文人也是唐代隐逸的主力军，其所占数量颇为可观。随着科举制的实行，无论文人先隐后仕，还是先仕后隐，抑或是仕隐相间，都可看出唐代文人践行隐逸之频繁，因而，在文学中表现仕隐情结的诗歌可谓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此外，唐代也有一些仕宦文人虽然并未走向山林，却在休沐、闲居、贬谪时表现出对隐逸的企羡，这类诗歌创作在《全唐诗》中广泛而客观存在，故也在本书所论范围之内。抛开后者去理解把握唐代的隐逸与隐逸文学，无论如何都是不完整的，也不符合历史现实与原貌。

二、研究缘起：唐人之隐的源流与特质

隐逸是士人阶层针对仕宦而产生的思想与行为。作为中国士阶层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隐逸与出仕共同构成了士阶层完整的文化传统。隐逸奠基

于先秦士阶层兴起之时^①，成熟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式微于元明清。隐逸的目的在于保证士人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生活内容和审美情趣。作为中国士阶层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隐逸对中国古代文人的的人格理想、立身处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而弥长的影响，同时隐逸在文化创造与文学艺术活动中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形成与廊庙文化既并立对峙又相互融渗的山林文化。这一文化以儒、道两家的隐逸理论为思想基础，因“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矛盾斗争而不断调整变化。

隐逸之风，渊源有自，上古时代就有巢父、许由傲世逃名的历史传说。《周易》中《蛊》卦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坤》卦中的“天地闭，贤人隐”，《遯》卦中的“肥遯，无不利”，等等，可以说是隐逸思想的最早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国无定臣，士无定主，一些士人不满现实政治的纷扰抽身而退、走向山林，这既是针对现实政治不得已的存身之道，同时也向当权者表明不满与批判的态度。早期的隐者基于无道的现实环境做出个体自发的选择，经过儒、道哲学的理论化后，“隐逸已不再是单纯的逃避行为，却可以解释成一种具有道德批判性的政治姿态，也可以代表一种人生理想的索求”^②。孔、孟奠定了儒家隐逸求志、待时权变的基调^③，老、庄则确立了道家对自然之道的崇尚和对自由人格的追求^④，二者共同奠定了儒道互补的隐逸观念与行为方式。西汉因中央集权的钳制、

①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相关章节的论述。

② [新加坡]王国纓：《中国山水诗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101页。

③ 《论语·泰伯》篇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季氏》篇中又言“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孟子·尽心上》亦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论语》之《微子》《八佾》《宪问》等诸篇，亦曾提及隐者七人、逸民七人。

④ 《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刻意》云：“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

养士之风的终结，史传记载隐逸不仕者并不多，“当士人不得不把进入行政官僚队伍作为寻求衣食和荣誉的要道通途时，他们的工具化就成为势在必行了，其通于世务、娴习政事，则往往以对东周及汉初儒士理想主义的逐渐放弃为代价”^①。这也是由士所持守的价值理想必须依附当权者的权力系统去实现所决定的。

汉末魏晋，隐逸风潮再次兴起，“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②。范晔在《后汉书》中专列《逸民传》并分析其归隐动机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③隐逸不仅是一种乱世避难全身的选择，同时也是性格与天分的自然呈现。魏晋时期，政局动荡，时局混乱，士人生逢乱世，无力解危救困，反而动辄得咎，人命微贱。当此之际，以政治道德为取向的儒家名教思想衰微，个人自我意识高度觉醒，道家思想随之抬头，人们寄情老庄，托怀隐逸，归栖之思因而得以畅行，并在此后的发展中，形成以隐逸为高趣的现象。^④随着玄学对儒与道、名教与自然、入世与出世的调和，隐逸的抗争意识已大为减弱。自此以后，东晋南朝的名士们宅心玄远，摒绝世务，优游俯仰于山水之间，在自然中体悟达道，追求冥合老庄的玄远之境。隐者以放情肆志、逍遥泉石、无意于出处为高风亮节。

唐代隐逸之风勃兴，隐者的身份广布于社会各个阶层，既有王公权贵、

① 于迎春：《秦汉士史·引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序》，中华书局，1965年，第2756页。文中所引《后汉书》皆是此版本，不再另行标出。

③ 同上书，第2755页。

④ 王瑶：《论希企隐逸之风》，《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文中所引《中古文学史论》皆是此版本，不再另行标出。

高门显宦子弟攀附时尚的隐逸，亦有州郡官吏的居官如隐，但为数最多的还是中下层文士的仕隐相间，真正以隐终生的文人屈指可数。唐代隐逸的价值标准也变得更为灵活机动。隐逸仍是唐代士人不得以仕行道时的选择，诚如韩愈《后廿九日复上书》中所言：“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①但唐人少有前代那样经得起推敲的隐逸名实观念，而更注重以名服务于实的客观实际，过去那种仕隐的二元对立在唐人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了。他们依违于仕与隐之间，以隐逸为权变，一旦仕途蹭蹬便隐居避患，等到时移势迁又再度出仕，依凭时势决定其出处进退，这样就使得隐者的身份日益复杂。此外，在隐逸之风的激励下，士人乐于把自己描述成隐逸之士，不仅隐逸山林习业被时人视为隐逸，而且得第后待时选官、被罢时赋闲待官、居官时休沐园林、官满后致仕^②等人生各个阶段多种形态的生活均被唐人视为隐逸生活的表现。故此《新唐书·隐逸传序》称：“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③可见，徘徊于仕隐之间的文士，一旦有机会实现入仕的人生理想，隐逸便退居次席。尽管史臣秉承史传文学对于传统隐逸观念的标准，提出隐逸要纯粹，要志尚高节、不慕荣利，但《旧唐书》《新唐书》中《隐逸传》收录的隐士仍十分芜杂。实际上，名不副实、名实两乖的隐逸在唐代非常普遍，时人虽时有讥诮，但仍有大量

① [唐]韩愈著，马茂元整理，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3页。文中所引《韩昌黎文集校注》皆是此版本，不再另行标出。

② 参见葛晓音《诗经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3～107页）关于待时而仕的隐居，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第293～294页）关于守选与唐人关系的论述，查正贤《论初唐休沐宴赏诗以隐逸为雅言的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的相关论述。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第5594页。文中所引《新唐书》皆是此版本，不再另行标出。

士子对此趋之若鹜。加之佛禅、道教等思想的影响，唐代隐逸的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灿然可见。因此，本书不是用传统隐逸观念的标准去苛责唐人，而是尽可能地借助史料诗文还原那段隐逸蔚然成风的尘封历史，全面展现唐代隐逸现象的完整图景并开掘其对于文人生活心态、诗歌创作的影响。

唐代是一个隐逸文化与隐逸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代，隐逸普遍而频繁地于文人的生活中被践行，不但决定着其价值观念、人生态度、行为模式、文化心理，而且对其创作心态、审美趣味、主题取向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造就平淡闲适的唐人心态和清幽淡远的唐诗风貌功不可没。隐逸对于唐代文人而言，既是一种现实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理想追求；既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也是一种精神需求。唐代文人受到隐逸的时代风尚的濡染浸淫，崇隐、咏隐并以高士自许，借以扩大知名度，为跻身仕途创造条件。同时唐代文人也将隐逸形之于歌诗，表达他们慕隐羡逸的情思，唐代文学因此成为全面、清晰、准确记录这一尚隐时代的“活化石”。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唐诗中丰富多样的出处主题、意蕴深厚的隐逸意象等，无不与隐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本论著的学术研究现状

涉足唐代文学史，难免遇到无数与隐逸相关的现象。令人惊讶的是，对隐逸这样一个源远流长而又牵涉颇广的问题，其研究仍显得相对薄弱。长期以来，从社会功利价值观出发，囿于隐逸之士“个人主义”“失败主义”“自私而萎缩的人生”的偏见，人们对隐逸与隐逸文学的文化价值认识还很不充分，评价甚低。许多学者站在儒家用世的功利立场上，认为隐逸这种非主流文化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和游离的存在，执着于其真伪的辨析与判定，不认同它的行为方式与处世哲学，不承认隐逸与隐逸文学自有的文化价值。

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对隐逸与文学的探讨主要散见于一些文学史以及唐诗综论的著作中,且大多颇为简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将中国文学分为“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并将拟议中的唐代文学的一章定名为“廊庙与山林”^①。四十年代,蒋星煜对这一选题做了专题性研究,他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②是目前可见最早的隐逸研究著作,书中专列《中国隐士与中国诗歌》一章,对盛唐隐逸名家有所论述。1949年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③中将隐士作为中国文化的第十四个特征而加以研究。在通史性的文学史或断代文学史研究中,隐逸现象也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外部因素被强调,其中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8年)、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为代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专设一章,论述盛唐的一批歌唱自然的诗人:贺知章、孟浩然、王维、裴迪、储光羲,揭示出他们的自然诗既是对陶、谢诗的继承发展,更是当时文人们放浪江湖、隐居山林、崇拜自然的浪漫时代的人生观的表现。苏雪林在《唐诗概论》中运用诸如文学与生活、风格与作家性格、流派与时代潮流等现代文艺观来分析唐代诗人和诗作,探寻唐诗的承续和流变,得出与传统迥然不同的结论,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个时期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是闻一多的唐诗研究。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以诗人兼文学史家的慧眼诗心与宏见卓识,对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予以关注研究,创获颇多,也较为突出,而他对隐逸诗人及其创作的专门研究则尤以《孟浩然》为代表。他的研究基本确立了隐逸与唐代文学相联系的研究理路。此后,以隐逸与唐代文学的关联为中心来探讨与阐释唐代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成为一种研究模式。此外,陈寅恪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

① 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83页。

文中所引《鲁迅全集》皆是此版本,不再另行标出。

②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44年初版,1988年再版。

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成都路明书店,1949年初版;学林出版社,1987年再版。

熔于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等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以上诸家的学术成果对本书的研究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唐代文学研究注重文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探讨，学界普遍用“人民性”“现实主义”等标尺去衡量分析唐代的作家作品。在此研究标准下，隐逸诗人因其政治倾向和作品的现实性与时风相悖而使对于他们的研究备受冷落，评价也不高。难能可贵的是，陈贻焮先生能逆当时学界贬低山水田园诗人的潮流而动，首次深入考辨王、孟的生平事迹并编年其作品，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他们诗歌的艺术精髓，正确地评价了他们的思想和诗歌艺术成就。^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隐逸现象的专著：聂雄前的《中国隐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高敏主编的《隐士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立伟的《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三联书店，1995年），王仁祥的《先秦两汉的隐逸》（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5年），傅谨的《仕隐之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韩兆琦的《中国古代的隐士》（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冷成金的《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7年），王德保的《仕与隐》（华文出版社，1997年），孙适民、陈代湘的《中国隐逸文化》（湖南出版社，1997年），马华、陈正宏的《隐士的真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许建平的《山情逸魂——中国隐士心态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等等。这些学者各以其所专之学对隐逸做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他们的论著主要是将隐逸定位于社会政治领域，侧重从社会政治层面研究隐逸的起源与发展，主要关注隐士的身份建构、特质类型以及与政治的关系，其主旨并不

① 陈贻焮：《谈孟浩然的“隐逸”》（《光明日报》，1954年8月22日），《王维生平事迹初探》（1958年5月，《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王维的山水诗》（《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等系列论文。

在于隐逸与文学的关联研究，故在此不多赘述。而一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虽是关于隐逸与文学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多限于魏晋南北朝或宋代，如洪顺隆的《由隐逸到宫体》（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许尤娜的《魏晋隐逸思想及其美学涵义》（文津出版社，2001年）、杨清之的《唐前隐逸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刘文刚的《宋代的隐士与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小兰的《宋代隐逸文人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或将这一选题置于整个古代历史时期做一宏观鸟瞰，如木斋等人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京华出版社，2001年），李生龙的《隐士与中国古代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陶东风、徐莉萍的《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便是如此。

与此同时，唐代隐逸与文学的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由关注名家转向关注中小作家，对文学大家有持续的深入研究，且过去不被人注目的中小作家如大历方外诗人群、晚唐隐逸诗人群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由个别诗人的隐逸心态、思想、创作等的研究转向特定时期、地域、流派、家族等的研究；由单一的文本研究转向文学—文化研究。这大大拓宽了这一研究的视野，并推动隐逸与唐诗综合性课题得以深入研究。

目前，就唐代隐逸与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文人隐逸与诗歌创作个案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主要指以单篇论文的形式，研究某个诗人与其隐逸经历之间的关系，认为诗人的隐逸经历或表现出的隐逸思想心态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以此来阐释诗人文学创作上的一些变化，其中尤以对王绩、孟浩然、王维、李白、白居易等的研究为代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明非《试论初唐诗人王绩的隐逸》（《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林继中《李白与唐代隐逸之风》（《天府新论》1994年第6期）、罗时进《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文史哲》1997年第5期）等。近些年来，一些名家的隐逸被

发掘出来，如宋之问、王昌龄、高适等，一些中小作家的隐逸与创作受到关注，朱桃椎、刘昫虚、李颀、秦系、于鹄、刘方平、方干、唐求、吴融、郑谷等诗家的隐逸生平及创作进入学界研究视野。此外，关于隐逸对唐诗题材、美学风格的影响的研究亦有学者涉猎，但多集中于单篇个案。

二是对隐逸诗人群体与文学创作的研究，这方面以对山水田园诗派的研究最为集中也最为深入。此外，大历诗人中的方外诗人创作群体、以白居易为首的洛阳闲适诗人群体以及晚唐五代的山林隐逸诗人群体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如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方外诗人创作论》的论述、胡遂《晚唐山林隐逸诗派概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6期）、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小兰《晚唐五代江浙隐逸诗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等。这些论著探讨了隐逸诗人群体的构成方式、文化品格、诗艺追求等，其中新见迭出，胜义纷呈。

三是对唐代文学作品中隐逸主题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学界近些年对吏隐主题的关注，对这个约定俗成而又模糊不清的文学现象和概念的重新探索，如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葛晓音《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洲吏”》（《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等。

四是对唐代隐逸文人与诗歌的文化学研究，这一研究初露唐代隐逸文学学术转型的端倪。比如园林与隐逸文人的关系探讨，如林继中《唐诗与庄园文化》（漓江出版社，1996年）、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从文艺学角度探讨隐逸的人格精神，如徐清泉《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论要——从隐逸文化、文艺实践及封建政治的互动分析入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切入分析唐代隐逸，如景遐东《中晚唐文士隐居江南之风及其影响》（《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